



# 中国考古层位学的里程碑之作\*

## ——《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导读

许永杰 (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研究中心)

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留下的论述不多,但字字珠玑,篇篇经典,令人咀嚼,回味无穷。发表在《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上的《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就是一篇中国考古学的经典文献(下文简称“《西安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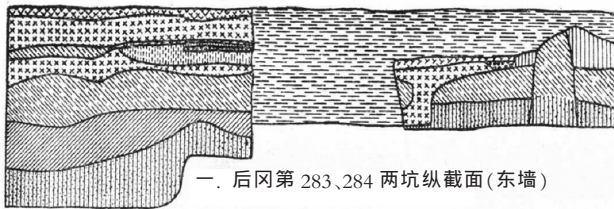
《西安附近》是与吴汝祚先生合作完成的,后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排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之后,连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结语》构成“调查、发掘报告文选”部分。学界在谈到苏秉琦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多是讲《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以及《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讲其对中国考古类型学建设的奠基作用,而较少谈及《西安附近》

在中国考古层位学发展中的里程碑意义。最先谈到《西安附近》意义的是张忠培先生的《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此文开篇就讲:“五十年代初期,苏秉琦先生在西安附近的开瑞庄(又名客省庄)发现的三叠层,是继安阳后岗、宁定阳洼湾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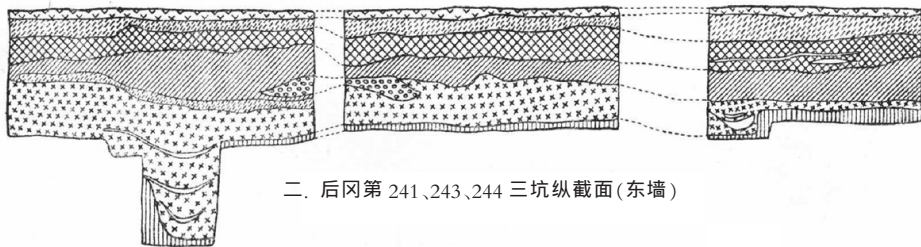
张先生所讲的安阳后岗的考古发现是指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河南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这

是中国考古层位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1931年,学成归国的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后岗遗址的发掘工作,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方法不同,也与此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三次发掘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方法不同,后岗遗址的发掘摒弃了以深度计分地层的发掘方法,采用了以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发掘方法,于岗中北部的第241、243、244三坑识别出小屯文化层叠压龙山文化层的层位关系,于岗西部第283、284二坑识别出龙山文化层叠压仰韶文化层的层位关系(请参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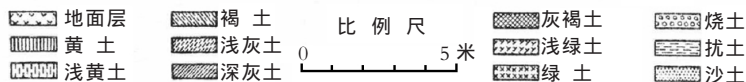
以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发掘方法是考古层位



一、后岗第283、284两坑纵截面(东墙)



二、后岗第241、243、244三坑纵截面(东墙)



图一 后岗遗址典型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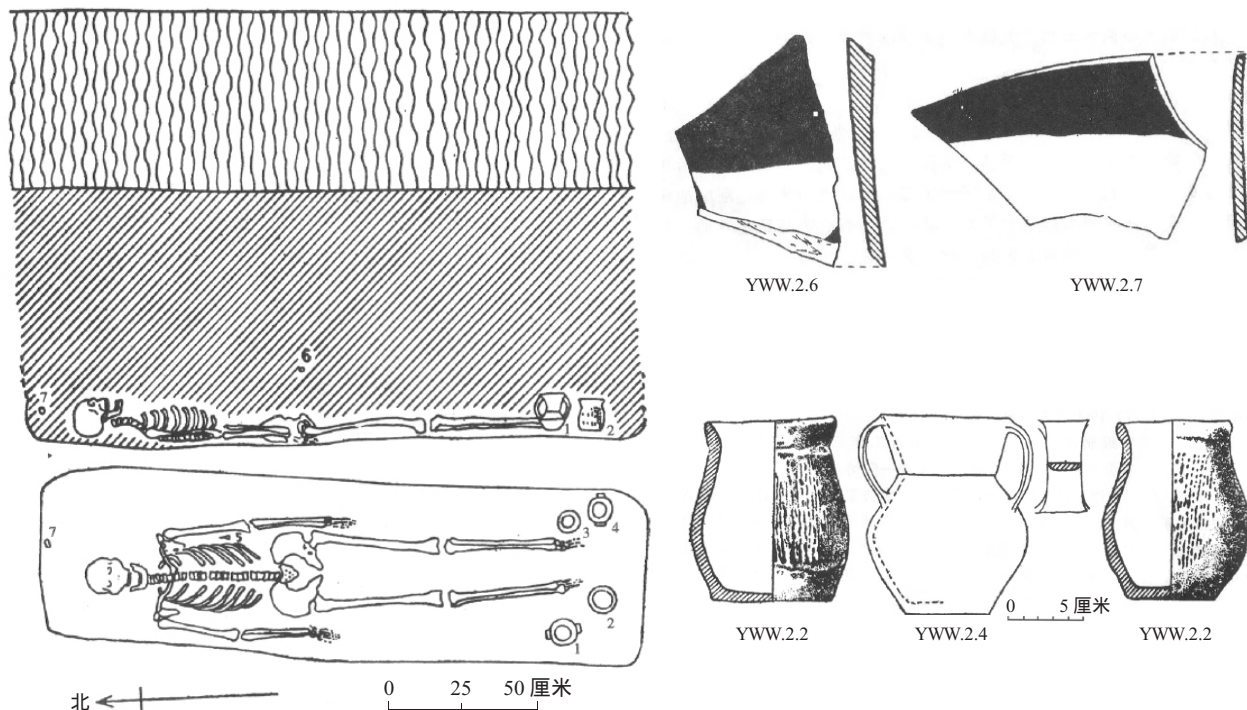
\* 本文属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研究项目“珠江流域史前聚落形态研究”成果;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项目“环海南岛明清海防设施调查”成果。

学走出考古地层学跨出的第一步,而以深度计分地层的发掘方法则是考古地层学尚未脱离地质地层学的重要标志。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因为人类尚处在游荡觅食的阶段,在同一地点的活动不够频繁,文化堆积主要表现为人类活动的遗存保留在自然力为主要成因的地层当中,文化堆积只是地层堆积一种形式,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结束了游荡觅食的生活,开始了产食的定居生活,在同一地点活动频仍,挖筑灰坑、地穴房址和墓葬,堆筑围墙、地面房屋和宫殿,使得原本较为平坦的地表变得凸凹不平,文化堆积除了地层堆积以外,又增添了遗迹堆积的形式。以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发掘方法,就是充分考虑到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是自然力和人类活动两个成因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就是以土质土色区分文化堆积,可以想见,如果不是以土质土色区分文化堆积,就不能识别遗迹堆积,实际上梁思永先生当年的后岗发掘就已经做出了灰坑和城墙两种遗迹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岗遗址的地层剖面中读出。

梁思永先生在后岗遗址以土质土色划分地层方法发现的小屯、龙山、仰韶三文化依次叠压的层位关系,为日后中国考古学纠正安特生龙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错误认识,提供了来自层位堆积的实证。

张先生所讲的宁定阳洼湾的考古发现是指夏鼐先生主持的甘肃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清理,这是中国考古层位学发展史上的第二块里程碑。1945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博物院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宁定县(现为广河县)阳洼湾墓地清理了两座齐家文化墓葬,其中第二号墓葬接近墓主盆骨和头骨处的填土中,发现两片彩陶。“这两片彩陶的泥质,颇细且匀,似曾经过‘冲淘手续’。外表磨光,绘黑色花纹。因为碎片过小,花纹图案不清楚。现存的部分仅剩黑色宽带的一部分,边缘平滑。就陶质及花纹而论,皆与标准型的仰韶文化彩陶无异。”夏鼐先生此处所言“仰韶文化”是指“甘肃仰韶文化”,或称“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从该墓地东北距安特生调查的半山墓地约半公里并结合彩陶纹样推测,这两块彩陶片属于半山类型的可能性较大。关于这两片彩陶的具体样式及其在墓葬填土中的位置,还有墓葬随葬的齐家文化陶器(请参见图二)。

在齐家文化的墓葬填土中发现甘肃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其在考古层位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是:是将墓葬本身与墓葬填土视作两个堆积单位。墓葬填土陶片与墓葬随葬器物的年代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填土陶片早于随葬器物,一种是填土陶片与随葬器物同时。前一种可能是挖筑墓穴时将打破地层中的



图二 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平剖面及填土陶片、随葬器物图



陶片回填到墓穴中,后一种可能是将原本可以作为随葬品的陶器打碎而掺入填土中。后一种情况在同一墓地的第一号墓葬中就有表现,墓主“颈侧有一红色陶耳碎片,大概是齐家式的薄壁耳瓶的耳部。这碎片似乎是墓穴填土时混入的。”由于该墓地只是对两座齐家文化的墓葬清理,而未发掘,缺乏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使得前一种情况不能直接得到说明,即便是该遗址缺乏甘肃仰韶文化的地层堆积,也不影响填土彩色陶片早于墓葬随葬的无彩陶器,因为还有多种早期遗物混入晚期堆积单位的可能。对此,夏鼐先生是这样推测的:“当齐家期的人民埋葬死人的时候,这些彩陶是已被使用过打破了,碎片被抛弃在地上,因之便被混入填土中”;“他们混入齐家期的遗物中,若不是较古的仰韶文化遗物,便是临近残存的仰韶文化区的输入品”。

依据将墓葬本身与墓葬填土视作两个堆积单位的考古层位学方法论的认识,《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报告,根据华县“元君庙半坡类型墓葬填土中存在着老官台文化陶片”的地层证据,得出老官台文化的年代早于半坡类型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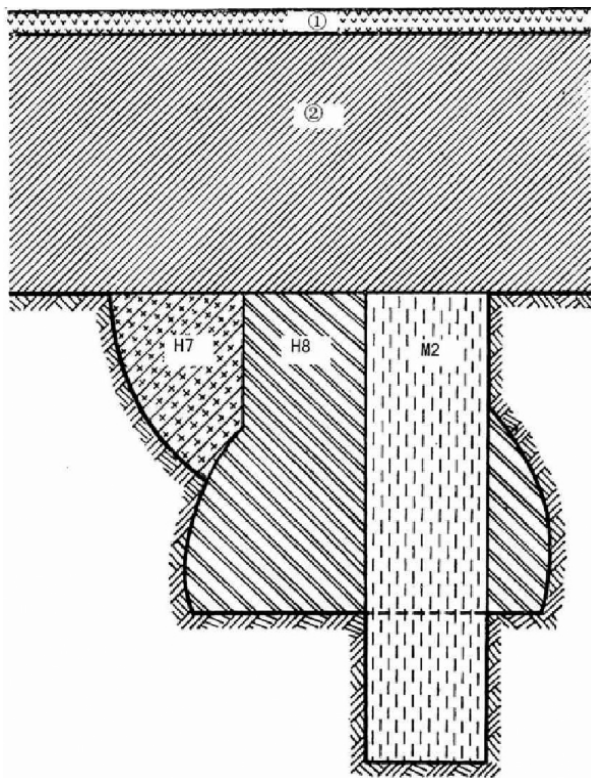
张先生讲的西安附近发现的三叠层是指苏秉琦先生率队的西安附近考古调查,这是中国考古层位学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1951年春,苏秉琦率石兴邦、王伯洪、白万玉等对陕西长安县沣河沿岸开瑞庄(客省庄)、马王村、斗门镇及附近的一些遗址做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并对开瑞庄北的一段断面进行了清理。该断面的堆积情况如下:

“①灰坑7原为一像锅底形的灰坑,大部分已被灰坑8打掉,剩下的不多;②灰坑8原为平底圆形覆杯状的地下窖穴,西南一大半先被墓2打破,后被近年取土剥露;③墓2为一东西向的竖穴,穿过灰坑8,在生土面下,其西部亦被近年取土切去,幸因墓坑底层深在坡下耕地的下面,保存完整;④墓2的竖穴坑口以上,现在的耕土以下,是成层的灰土。这样就形成一个如图一所示的包括四个时期,以灰坑7、灰坑8、墓2及其上层为代表的连续堆积的断面。”(请参见图三)

这一发现之于中国考古层位学的意义,笔者在《考古层位学札记三则》中是这样表述的:

1. 继梁思永发掘河南安阳后岗遗址之后,再次发现仰韶、龙山、历史时期(殷代、周代)的“三叠层”。

2. 揭示出遗迹堆积与地层堆积在考古层位学



图三 开瑞庄北灰坑7、灰坑8、墓2断面示意图

上具有相同的意义,两者在遗址的有序堆积中,均属独立的堆积单位,具有相同的分期意义,即无论是地层堆积还是遗迹堆积均可代表一个时代。

3. 给出在层位堆积中,除叠压、打破两种地层关系外,还存在第三种地层关系——“平列”的启示。所谓“平列”即叠压在同一地层之下而又同时打破同一地层的堆积单位,年代不一定是同时的,其年代关系存在多种可能。

关于第一点意义,张忠培先生在本文前引《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一文中所称的‘文化一’、‘文化二’,现今一般名为庙底沟类型和客省庄第二期文化,‘文化三’即西周时期的遗存。正当学术界热烈讨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这一重要课题的时候,苏先生将分布于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遗存,区分为两种考古文化,并提出它们之间和它们同西周文化的年代关系的论点,不仅把渭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还为探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据。”张先生的这段论述充分而精辟,本文于此无需再做讲述。

关于第二点意义,涉及到对考古层位学原理的理解。目前的中国考古学虽然大家都在使用考古层

位学的原理指导发掘,都在使用发掘中获得的堆积单位的堆积顺序确定遗存的年代顺序,但是在理解不同形式的堆积单位——地层堆积与遗迹堆积——的关系上,却存在很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地层堆积是整个文化堆积的纲,用地层堆积来统领遗迹堆积,遗迹开口在哪一层就属于哪一层,遗迹打破哪一层就属于哪一层(阅读考古报告时,经常会碰到“某某遗迹位于某某层”这样的记述),也就是遗迹从属于地层,地层关系也就是遗迹的层位关系,没有两个以上的地层堆积,遗址就不能分期,没有地层与遗迹的叠压关系,遗迹就不能分期。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每个地层堆积、每个遗迹堆积都是分类级别相同的堆积单位,都可以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都可以代表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每个单位在一定的堆积顺序中均有自身的位置,不存在谁属于谁的从属关系,一个堆积单位既不属于哪个单位,也不包含哪个单位;单位之间只有不同层位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同一层位下的并列关系。前一种认识,我们可以称之为“考古地层学”,因为其尚未摆脱地质地层学的束缚;后一种认识,我们可以称之为“考古层位学”,因为其充分考虑到考古堆积的特点,即人类活动对于文化堆积形成的作用,从地质学移植来的地层学有了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层位学对于文化堆积中的地层堆积与遗迹堆积的这种进步的理解,完全可以认为始自开瑞庄北的这处典型剖面的发现。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齐家文化分期问题的讨论<sup>⑩</sup>,看似讨论双方对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永靖秦魏家等三处遗址和墓地的分期方案的分歧,实质上却是双方使用的分期方法论的不同。具体可以皇娘娘台遗址为例,一方是考古地层学方法,认为“据《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导,皇娘娘台遗址地层堆积共分三层:第一层,耕土;第二层,发现房屋残迹,还有墓葬;第三层,发现房址、窖穴和大部分墓葬。齐家文化遗存主要是第二层和第三层,若把它相对年代分为早晚两期是无异议的。”<sup>⑪</sup>;一方是考古层位学方法,认为依据遗迹堆积的打破关系,“可把皇娘娘台的遗存分为如下自早至晚四段:一段:以F8为代表;二段:M29组;三段:M38组;四段:M27组”<sup>⑫</sup>。很显然,第一种我们姑称之为“考古地层学”的认识是:分期必须依据地层堆积,有几层地层就应分为几期,而遗迹堆积是从属于地层堆积的,第二种我们

称之为“考古层位学”的认识是,遗迹堆积是与地层堆积相同的独立的堆积单位,在遗址的分期中具有相同的意义。

邹衡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早具有“层位”、“层位关系”意识的人之一。早在1956年写成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在序言部分就使用了“层位”概念<sup>⑬</sup>;在1964年写成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sup>⑭</sup>,不但多处出现“层位”、“层位关系”概念,更是使用“层位关系”作为节题,即第二部分“典型层位关系的分析”。在《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中,虽然二里冈遗址上下两层的文化面貌主要是靠灰坑堆积中出土器物认识的,但是两期遗存的年代顺序还主要是靠地层堆积认识的。到了《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时,不但殷墟遗址四期的文化面貌主要靠遗迹堆积中出土器物来认识,四期遗存的年代顺序也主要是靠遗迹堆积来认识的。邹先生主要使用遗迹堆积遗存材料进行分期的方法,可以看成是苏秉琦先生西安附近文化编年序列建立方法的延续。以遗迹堆积遗存为主干材料构建的殷墟文化分为四期的认识,历经数十载的发现与研究,今天已经为学界奉为晚商考古学文化分期的不二方案。邹先生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中国考古层位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而中国考古层位学的形成应在20世纪80年代,其标志是在苏秉琦先生和张忠培先生的文章中都出现了“层位学”的概念<sup>⑮</sup>。

关于第三点意义,是这一剖面以实证的形式把开口在同一层位下的遗迹堆积年代不一定同时的例子呈现在研究者的案头,使人们意识到在文化堆积中,除叠压、打破两种层位关系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层位关系,即“并列关系”。笔者之所以使用了“启示”一词,是考虑到开瑞庄北的这段剖面还不是最典型的并列关系,因为同压在第二层下的三个遗迹堆积单位之间,存在着相互打破的层位关系。典型的并列关系应是:叠压在同一地层之下而又同时打破同一地层的诸遗迹堆积单位彼此之间不发生叠压或打破关系的层位关系,就像内蒙古敖汉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那样<sup>⑯</sup>。该墓地共清理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804座,墓葬均开口于耕土层之下,仅有两组四墓有打破关系,“第一组,是M28东侧长壁挖入相邻的M27西壁长壁2厘米宽的一条;第二组是M878的西侧长壁北端挖在以北的M868龕内的东墙上”,而其他800座墓葬之间再无叠压



打破关系,不可以想象这 800 座墓葬的主人是同一天下葬的,报告主要根据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最终将这 804 座墓葬划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层位学札记三则》一文对于并列层位关系,已有充分论述,于此不再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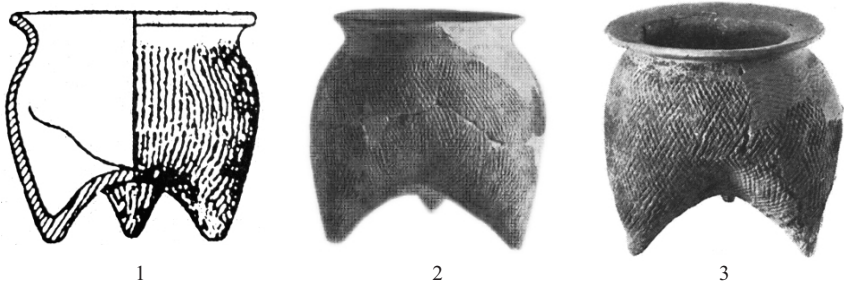
在《西安附近》一文中,苏秉琦先生使用“文化一”、“文化二”、“文化三”的写作方法来指代由 H7、H8、M2 和第②层代表的三种文化遗存,而不直呼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西周文化”,是有深刻用意的。笔者理解,首先是他已意识到所谓的“仰韶文化”内涵并不单纯。由于当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时,采用的是按水平下挖的方法,使得不同时期、不同文化性质的考古遗存混杂在一起,未能得到识别<sup>⑧</sup>,严文明先生专门撰文对其不同时期的遗存予以识别<sup>⑨</sup>。以今日对陕晋豫地区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认识,仰韶村遗址至少“包含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泉护村二期文化、平陆盘南村为代表的遗存、庙底沟二期文化、三里桥二期文化和西周文化等几个时期的多层堆积。”<sup>⑩</sup>而在开瑞庄遗址,庙底沟类型、与三里桥二期文化相类的遗存和西周文化却是表现在 H7、H8、M2 和第②层等不同堆积单位中。其次是他意识到以 H8 单把鬲为代表的遗存与安阳后岗中层的单把鬲遗存以及仰韶村的单把鬲遗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冠以地区相区别的“龙山文化”的相互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鉴于材料单薄,而持以“文化性质及名称待商讨”的态度。继之而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立时证明苏先生使用数字指代文化性质做法的睿智与英明。50 年代中后期,由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sup>⑪</sup>和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sup>⑫</sup>,在“仰韶文化中”正式区别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开瑞庄 H7 为代表的“文化一”即属于“庙底沟类型”;50 年代中后期,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开瑞庄(客省庄)遗址正式发掘,在 1962 年出版的《沔西发掘报告》中<sup>⑬</sup>,提出了“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的命名,即 H8 为代表的“文化二”。

1984 年,俞伟超和张忠培两位先生在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撰写的《编后记》中<sup>⑭</sup>,有一段对《西安附近》一文的评述:

“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写作的《西安附近古文化

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中,当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同时并存还是前后相继的问题尚未解决,陕晋豫邻近地区仍被很多人视作是这两种文化形成的‘混合文化区’,半坡、沔西遗址刚刚发掘,庙底沟遗址尚未发掘时,又远远早于他人而概括出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和西周及东周文化这几种遗存的早、晚关系及其重要特征。在 1951 年发表的《简报》中,苏先生指出,前两种遗存‘和河南境内的两种不同的史前文化遗存好像是遥遥对照的’。”

这段评述基本是对本文上引《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序言部分相关内容的复述,但是我們注意到,在这里除了庙底沟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和西周以外,有多出了“东周文化”第四种遗存。检对《西安附近》一文的文字和插图可知,插图四 1、2、3、4、5 出自 M2,分别为陶鬲、蚌泡、蚌鱼鸟形器、玉圭形器、玉兽形器,其陶鬲时代特征明显,作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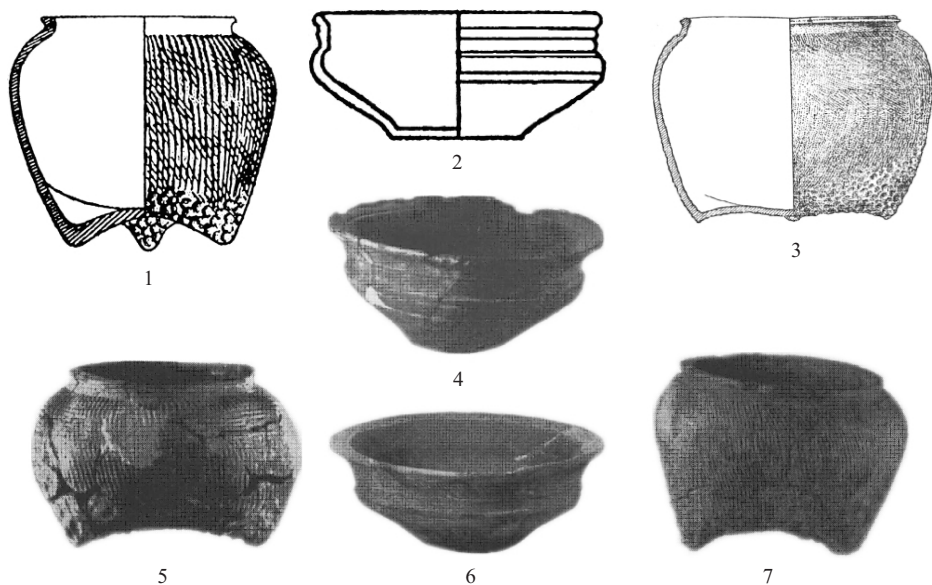


图四 西周早期陶鬲对比图

1. 开瑞庄 M2 陶鬲 2. 张家坡 T309:2A 3. 客省庄 T52:2

口、束颈、鼓肩、联弧瘿裆较高状,器表饰竖向绳纹,与 1955 年客省庄遗址发掘的 T52:2 西周陶鬲、1956~1957 年发掘的张家坡西周早期居址<sup>⑮</sup>T309:2A 陶鬲形态相同,属于西周早期的典型器物,M2 的年代当属西周时期无疑(请参见图四)。插图四 6、7、9 出自第②层,分别为残陶鬲、陶鬲、陶盆,其陶鬲时代特征明显,作低领、小口、窄平沿、鼓肩、足距较近,实足尖较低状,器表饰交错绳纹,器底饰麻窝纹,与 1955 年客省庄遗址发掘的 T19:2、K211:3、K208:4 等战国陶鬲属于同型器物,而整体器形和鬲裆较其略高,年代也当略早于这几件陶鬲,陶盆时代特征也比较明显,大口微敞,浅腹下部内收,器表饰弦纹,与客省庄 H92、K211:5 等陶盆形态相同,年代接近,因此第②层的年代可以修订为东周时期(请参见图五)。

倘若开瑞庄村北的典型剖面第②层的年代修



图五 东周陶器对比图

1. 开瑞庄 M2 陶鬲 2. 开瑞庄 M2 陶盆 3. 客省庄 T19:2 4. 客省庄 K211:5  
5. 客省庄 K211:3 6. 客省庄 H92 7. 客省庄 K208:4

订为东周时期,而 M2 的年代为西周时期,那么是否就应否定《西安附近》一文关于遗迹堆积可以与叠压其的地层堆积年代相同的层位学原理呢?笔者以为不能,因为人们可以在自己活动的地面上挖筑中空体的使用空间——灰坑、半地穴房屋、墓葬等,所以遗迹堆积可以与叠压其的地层堆积年代相同的层位学原理依然成立。可举实例为证:1997 年沔西遗址 97SCMT1 的第③层与开口于该层下的灰坑 H8 的年代同为该遗址分期的第四期,即西周中期<sup>⑨</sup>。

使用数序指代那些材料尚不十分充分、文化性质尚不十分明确、问题刚露端倪的考古遗存,是一种留足回旋余地的稳妥的表述方法,后来为张忠培先生所沿用。他在《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一文中<sup>⑩</sup>,使用“文化一”、“文化二”、“文化三”指代三种文化名称尚缺乏统一意见的考古遗存,其“文化一”是篦纹陶和细石器组成的文化遗存,“文化二”是后来称作“西团山文化”的文化遗存,“文化三”是一种在文化面貌上与西团山文化比较接近而应区分开来的文化遗存。

在考古调查中,清理断面以获取典型剖面 and 典型堆积单位资料的做法,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田野工作的一种常规手段,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晋陕大峡谷北段黄河两岸的山西、陕西两省境内很多地

点,都发现有商代晚期的中原系青铜器和北方系青铜器<sup>⑪</sup>,很容易将其主人与古籍、甲骨文、金文中记载的环踞商周北方的“鬼方”、“土方”、“方”等强势方国相联系,但却限于材料的零散、孤立,难下定论。1982 年和 1983 年,晋中考古队在结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后,两度进入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做考古调查<sup>⑫</sup>,期待能发现与商代晚期青铜器同时期的陶器等其他遗存。在离石的后赵、马茂庄、双务都和柳林的高红遗址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

存,并在曾出有北方系青铜器的高红遗址<sup>⑬</sup>的断崖上清理一座灰坑(编号为 H1),出有柱足鬲、花边口鬲、小口折肩雷纹罐、卵形三足瓮等器物,推测“他们与吕梁山屡见的青铜器关系最为密切,两者可能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高红 H1 代表的遗存与同时期黄河对岸发掘的陕西清涧李家崖城址的文化面貌一致<sup>⑭</sup>,在调查中清理断崖的做法收到了与考古发掘相同的效果,这两项工作表明这一类考古遗存(“李家崖文化”)在晋陕两省的北部有着比较广泛的分布,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基本重合。2004 年,山西省考古所又在柳林高红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工作<sup>⑮</sup>,遗址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在山梁顶部共发现商代夯土基址 20 余处,出土遗物与当年清理的 H1 相同,报告将其认定为是重要性远超李家崖城址的城址,“高红遗址亦或就是鬼方或土方的某个政治集团的中心所在”。高红城址也因此被评为 2006 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自 1921 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采用布方式方法发掘始,经梁思永在后岗遗址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堆积,经夏鼐在阳洼湾遗址区分齐家文化墓葬填土陶片与随葬器物,经苏秉琦在开瑞庄遗址将遗迹堆积与地层堆积视为意义相同的堆积单位,再到邹衡在《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中使用层位堆积概念和张忠培在《试论东庄村

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中使用从层位入手的分期方法(笔者拟撰另文阐述),中国考古层位学经历了从产生到成熟、从移植到形成特色的发展过程,几代中国考古先辈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经典案例也成为中国考古层位学发展的里程碑,这也是中国考古学成长历程的阶段性的标识。

注释: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a. 俞伟超:《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座里程碑》,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b. 杨晶:《中国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读〈瓦鬲的研究〉》,《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张忠培:《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岗发掘小记》,《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后岗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即殷墟发掘的第四次和第五次,三叠层是第二次发掘(即殷墟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参见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尹达:《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夏鼐:《齐家墓群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郭大顺、高炜:《苏秉琦年谱——1909~1997》,宿白主编:《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许永杰:《考古层位学札记三则》,《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⑪ a.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b. 陈迟:《关于齐家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1988年第6期; c. 伊竺:《大何庄遗址“分段”研究商榷》,《考古》1988年第6期。

⑫ 陈迟:《关于齐家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1988年第6期。

⑬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⑭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原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后收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收入论文集的该文,经过1978年3月修改,用“层位关系”替代了“层位”。

⑮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4期,后收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⑯ a. 苏秉琦、殷玮璋:《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第4期; b.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第5期。

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⑱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5号,1923年。

⑲ 严文明:《从王湾看仰韶》,《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⑳ 黄景略、张忠培:《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㉒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㉓、㉔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沚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㉕ 俞伟超、张忠培:《探索与追求》,《文物》1984年第1期;后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沚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本文于此原本想在开瑞庄(客省庄)1955年的发掘中举例,但是检索《沚西发掘报告》,其“图五,客省庄村北的地层示例”所给4个灰坑均无坑号,无法和对其所出器物,进而无法明了其与叠压其上的地层堆积的年代关系;退而求之于1956~1957年的张家坡遗址,其“图四五,张家坡遗址的地层堆积示例”,开口在西周晚期和西周早期两层之下的遗迹堆积各有一个,分别为H154和H143,但又惜无器物发表,同样无法明了其与叠压其上的地层堆积的年代关系。

㉗ 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4年第1期。

㉘ a.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b. 吕智荣:《试论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

㉙ 晋中考古队:《山西娄烦、离石、柳林三县考古调查》,《文物》1989年第4期;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

㉚ 杨绍舜:《陕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

㉛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㉜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4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试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学会:《三晋考古》(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